

大国发展之道为什么必须以内循环为主

王小广

任何经济体的发展都离不开两个循环:一个是内部循环,一个是外部循环。一国要实现长远发展,究竟以内循环为主,还是以外循环为主,核心依据是什么?这不仅是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更是现代化模式选择中的根本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选择,是对毛泽东时代“独立自主、重工业优先”战略和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依托国际大循环”战略的继承、完善与升华。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的“核”,其重要性堪比“农村包围城市”之于中国革命、“重工业优先”之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际大循环”之于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奇迹。如果对这一战略认识不到位,将直接影响“新两步走”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更严重的是,若不能建成强大的新发展格局,我国经济发展很可能像许多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甚至失败。

大国为什么必须走“内循环为主”之路?

对经济现代化来讲,循环模式选择是第一位的问题,即实现现代化主要依靠内循环,还是主要依靠外循环,这既决定资源配置总效率,也决定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的支撑点。

从现代化的实践看,全球人口1亿以上的16个国家中,成功实现现代化的仅有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都选择了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道路,美国两百多年来贸易依存度长期保持在20%左右;日本虽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贸易依存度长期低于40%,近年约36%。仍显著低于小型外向型经济体。而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为322%、荷兰为156%、贸易依存度均远超100%,其现代化模式必然以外循环为主。而介于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中等人口规模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等,贸易依赖度都超过了一半,即50%至90%左右不等,它们都选择内外循环并重。为什么存在这样的明显差异呢?根本原因就是为实现共同的高水平发展目标而获取的方式差异。大国即使国

内资源匮乏如日本,由于人口与人力资源规模效应巨大,国内经济可循环,仅仅依靠国内大循环就能使人均GDP或人均居民收入达到高水平,外循环只是满足进口原料、搞活经济、参与国际竞争获得有利地位等需要,即只是作为人均GDP来源的补充。

而小国,即使效率最高、国民最努力,单靠国内资源和市场,都无法实现人均GDP目标,如新加坡,如果没有外循环,它的人均GDP将会长期停留在中等水平,一般为2万美元左右,而只有做大外循环,当外循环占比是内循环的2—3倍,就能使国内的人均收入提高到美国甚至更高的水平,比如今新加坡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同理,中等人口规模的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只能一半多点靠内循环,另一半左右则要靠外循环。

大国循环模式的根本逻辑是从“效率优先”到“安全与发展并重”

那么,有个问题来了,既然中等人口国家和小国可以靠外循环增加人均GDP,那么大国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长期发展外循环上,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不然。因为决定内外循环能否真正做强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自主性、安全性和开放度等四个维度。高开放度是前提,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需要高开放度,不断提高开放水平。

而发展水平、自主性和安全性在循环模式选择中的作用却因国家大小而不同。

第一位的决定因素是获得人均收入的方式(对两类循环的不同要求),第二位则是经济自主性,最后才是安全性。小国为追求人均高收入,必须选择主要依靠国际大循环,但却不得以牺牲经济自主性和国家安全性为代价,在经济自主性和国家安全性之间,又是更多地牺牲安全性(把安全交给可信任的大国),而努力获得相对较多的经济自主。

大国的选择则相反,安全与发展同样重要,缺一不可,最后形成了以内循环为主、高自主性、高开放度和高安全的组合,将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作为发展的核心目标,并在国内

大循环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下实现高水平、高自主性、高开放度、高安全性的现代化目标。

经济发达,即经济发展水平高,是大国的终极目标,这由循环模式所决定。其关键支撑则是三高——经济高自主性、高开放度、高安全性。

就大国而言,在高水平开放下,如果经济过度依赖外循环,那么它的外部风险将会显著提高,比如贸易摩擦增速将会显著快于贸易增速,且更强的国家会采取各种措施阻碍后发展国家。如果国内经济自立自强的能力不够,两者结合,难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上种种原因,大国必须走国内循环为主、经济高自主性、高开放性和安全性的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到了关键期,循环模式非变不可

中国正处于从全面小康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还有两个重要现实考量:

一是外部风险空前加大。作为超大型人口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叠加意识形态差异与“修昔底德陷阱”等因素,中国在现代化关键期面临的外部风险挑战更大、更具破坏性。美西方对华遏制将越来越疯狂。为此,必须主动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科技强国、消费强国,掌握全球经济发展主动权。

二是传统循环模式难以为继。改革开放后30多年,我国利用全球化机遇,采取国际大循环战略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这一战略只是“中间战略”,不可持续。2006年,我国贸易依存度曾高达64%,目前已降至一半左右,预计到实现现代化时将进一步降至20%左右。传统模式明显偏离大国现代化路径,且面临对外资外贸过度依赖、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困境。从经济循环的可持续性与安全性出发,必须改变循环模式,构建新发展格局,否则经济发展动力将逐步衰竭,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加剧。

以内循环优势筑牢大国根基

那么,如何才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使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这不仅是政治逻辑,更是被实践反复证明的发展规律。“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任务艰巨、形势复杂,对管党治党提出了更高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从来不是游离于经济发展之外的“党务工作”,而是贯穿发展全过程、各领域的“硬核支撑”。

有效的管党治党,确保发展不跑偏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离开了党的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失去方向;而党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关键取决于管党治党是否从严从实。管党治党越是深入彻底、越是科学有效,党就越能够把准方向、凝聚力量、抵御风险,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最根本、最稳定的保障。

经济社会发展不是自发演进的过程,尤其在我国这样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必须依靠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推进。“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如果管党治党不严,党的领导就会弱化、虚化、淡化,导致政令不通、各自为政,甚至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反之,通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肃的政治纪律,能够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而保证国家发展战略、区域协调政策、重大改革举措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正是依靠有效的管党治党,党才能在脱贫攻坚、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高质量发展等大仗硬仗中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强大合力,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行。

有效的管党治党,凝聚干事创业的人心力量

发展的任务要靠干部落实,发展的根基在于群众支持。管党治党的有效性,集中体现在能否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并以这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通过健全选拔任用机制,把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通过完善激励容错机制,激发干事创业积极性;通过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负松绑。实践证明,哪里管党治党抓得实,哪里干部就更敢有战斗力,营商环境就更好,发展后劲就更强大。

在厚植群众基础方面,管党治党越有效,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越紧密。通过常态化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及时回应急难愁盼;通过严格党内监督、规范用权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当人民群众坚信党是真正为他们谋利益的,就会自觉投身到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事业中,形成万众一心、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反之,管党治党宽松软,脱离群众、漠视民生,发展也会因失去群众支持而举步维艰。干部能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自身问题,防止小风险演变成大问题。这种自我革命的机制,使党在风云变幻中保持战略定力,主动应变应求应变,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制度环境。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的伟大复兴,正是在管党治党实践中不断优化治理体系,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熟,从而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活力和增长潜能。

(作者为黄石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

管党治党力度是发展的“硬核支撑”

陈敬乐

青马在线

世界“向东看”的时代潮流与文明逻辑

姜修翔

近日,中国再次迎来“访华潮”,多国领导人密集到访,国际人文交流深入开展,世界目光持续向东方聚焦。

在变乱交织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向东看”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国际潮流,国际社会越来越期待听到中国的声音。表面上看,是中国提供了“稳定”——这一当今最稀缺的要素;深层次看,这背后离不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瞩目成就,离不开中国面对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所作出的顺应时代发展的正确选择。

随着中国科技快速发展,中华文明持续走向世界。新时代以来,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活力持续提升。2013年至今,文化产品进出口规模稳居世界首位,保持着全球文化产品最大出口国的地位。文化产业的发展带动中国元素走向世界市场,海外民众通过中国的文化产品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向往中国;中国民众也通过海外文化产品认识世界。海内外文化产业的有效联

动,推动了全球文明共享互鉴、民心相通。

与此同时,中华文明元素借助数字化、科技化在海外产生热烈反响,传播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互联网+文化”“数智+文化”发展迅猛,5G、VR、AR等技术的普及,赋予中华文化更多元、时尚的表达方式,让历史悠久的中国非遗在走向世界时焕发出蓬勃生机。例如,《如果国宝会说话》运用三维图像技术呈现文物细节,深受海外观众喜爱。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海内外数十家顶级博物馆,带领全球观众线上观展,《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等古代绘画借助数字技术与虚拟现实手段“再获新生”。科技发展推动了中华文化以更新、更快、更好的方式走向世界。

其实,世界“向东看”并非始于今日。回顾中华文明对外开放、拥抱世界的历史,足以看到中华文化独特的感召力。西汉张骞二度出使西域,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而海上丝绸之路则始于秦汉时期。隋唐对外交流兴盛,广州成为南方重镇。宋朝时期,泉州成为东南沿海第一大

港口。明初郑和下西洋,积极开展对外通商。明末清初,传教士将中国儒释道思想带到西方,欧洲掀起“中国热”,东学西渐之风深刻影响了启蒙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使其在思考中开始反思自身文明。这些历史事实证明,中华文明始终具有开放包容、走向世界的基因。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一度蒙尘。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带领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文化建设取得新进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新时代以来,党的文化意识更加强烈。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深刻而宏阔。在此背景下,世界文化、人类文明的发展格局正在调整与重塑,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当代中国不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

从文明交流的宏观视野来看,世界“向东看”的深层动力,源于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

化=西方化”的迷思,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在经济发展上,中国保持长期稳定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在减贫领域,中国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占全球减贫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在全球治理上,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提供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公共产品。这些成就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文化输出,让世界看到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

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世界提供了独特的价值资源。和而不同、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理念,与现代全球治理的需求高度契合。当西方世界面临价值危机和治理困境时,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智慧愈发显现出其时代价值。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国家愿意“向东看”、愿意倾听中国声音的深层原因。

(作者单位为武汉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化自信越深厚,政绩观就越端正

谢人和

本思想始终是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这一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相结合,形成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最深厚的文化根基。只有深刻理解“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文化,才能真正做到“为民造福”而不流于口号;只有将人民立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文化自信才能从文化认同升华为执政自觉。

正确政绩观涵养文化自信的时代内涵

意识是物质世界的主观映象。党员干部政绩观三个核心问题,即“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正是立足实际、对时代发展所需提出的主观反映和价值遵循。意识活动的能动性决定了正确的政绩观能够引导党员干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聚焦高质量发展,推动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具体而言,正确政绩观从三个层面涵养文化自信的时代内涵:一是以正确政绩观中的“党性引领”把握文化自信的价值方向。党性是政绩观的灵魂,也是文化自信的政治保障。只有坚持党性原则,文化自信才不会偏离正确方向、沦为文化自负或文化保守。二是以政绩观中的“真抓实干”让文化自信落地生根。文化自信不是书斋里的抽象思辨,而是要在实践

中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精神力量。三是以政绩观中的“可持续发展”传承文化自信的根脉。真正的文化自信需要代代守护、薪火相传,这就要求政绩观必须具备历史耐心,既做显功也做潜功。

反之,政绩观偏差和错位,会浪费资源、助长形式主义、滋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最终劳民伤财,阻碍社会进步和发展。错误政绩观往往伴随着文化迷失——要么盲目崇拜、丧失文化主体性,要么故步自封、拒绝文明交流互鉴。因此,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从而为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文化自信为正确政绩观提供价值引领和思想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和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文化自信属于上层建筑、属于先进的社会意识,能够能动地指导社会实践的发展。具体来说,文化自信所涵养的政绩观,能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发展。

文化自信对正确政绩观的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第一,价值取向上,文化自信锚定“为民造福”的政绩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智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彰显着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也推动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优秀政绩观落地生根。这种文化基因让领导干部在面对政绩选择时,能够自觉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而不是追求个人升迁或短期轰动效应。

第二,实践准则上,文化自信提供“系统施治”的政绩方法。中华文化强调调整思维、系统观念,“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等理念启示我们,政绩不能是碎片化的、顾此失彼的。真正的政绩应当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是显绩与潜绩的有机统一,是当前发展与长远利益的统筹兼顾。

第三,精神境界上,文化自信涵养“久久为功”的政绩心态。传统文化推崇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十年磨一剑”等精神,与共产党人“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恒心,彰显着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也推动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优秀政绩观落地生根。这种文化基因让领导干部在面对政绩选择时,能够自觉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而不是追求个人升迁或短期轰动效应。

(作者单位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厚植文化自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二者协同之力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文化自信解决“为谁执政”的思想问题;正确政绩观解决“如何执政、如何担当”的实践问题。正确政绩观为发展锚定方向,文化自信则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精神动力。正确政绩观的树立和践行,能够涵养文化自信的时代内涵;文化自信则为正确政绩观提供价值导向和思想指引,两者双向赋能、同频共振,共同绘就“十五五”发展新篇章。

正确政绩观与文化自信具有内在同一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目的归宿,是厚植文化自信的中流砥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从政绩观来看,“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从文化自信来看,本质也是坚守人民立场的价值取向。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初心和使命,是对古语“天地之大,黎元为先”的真实写照。只有一心为民、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树立正确的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才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正确政绩观与文化自信在价值原点上高度契合,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从“民惟邦本”到“民贵君轻”,从“为政以德”到“仁者爱人”,民